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

**Sponsored by China's State
Foundation for Social Sciences**

内 容 提 要

本书在民族心灵史与古代文学史的双重背景下,追寻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演绎魏晋人格的诗性建构。魏晋文学是魏晋人格的精神投射与诗性显现,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在汉儒人格范型“中断”之前提下,历经“邺下一竹林一金谷一兰亭一南山”之地理移位,以及与之相表里的“孕育—徘徊—焦虑—消释—重铸”之心理流变,最终形成委运大化、真率冲淡的人格范型;魏晋人格是魏晋文学永远的神韵与不死的魂灵,魏晋人格远承庄学血脉而近铸玄学内质,在苦痛时代求索对灵魂痛苦的超越之途。魏晋人格的悲剧性发生,在“生命意识—处世哲学—情感特质—伦理观念—心态祈向”等不同层面酿成“生死—出处—情性—狂慎—静躁”等多层次的具有审美特质的对峙与统一,从而赋予魏晋文学以一种人格化的清风峻骨。艺术的人格化与人格的艺术化,构成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的相生相济,并最终铸成魏晋文学与人格的永恒魅力。

目 录

绪论 魏晋文学的人格魅力·····	1
一、何为“人格”·····	1
二、魏晋人格·····	3
三、魏晋人格与魏晋文学·····	4

上篇 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

第一章 庄学渊源·····	9
一、《庄子》理想人格及其特征·····	9
二、远承庄学之绪的魏晋人格·····	15
第二章 党人玉碎·····	21
一、党锢之祸导致汉儒人格的断裂·····	21
二、曹操人才观与魏晋人格重铸·····	26
第三章 邺下悲慨·····	33
一、曹操诗之悲慨与邺下人格基调·····	34
二、曹丕文气说的人格内涵·····	39

三、慷慨悲心——建安七子的文气类型·····	47
四、曹植的心理焦虑与诗性超越·····	53
第四章 竹林徘徊 ·····	62
一、阮、嵇诗文(上):主体人格之高扬·····	63
二、阮、嵇诗文(下):在忧愤中徘徊·····	70
三、走出竹林——魏晋之交的“文心”与“人心”·····	77
第五章 金谷歧路 ·····	84
一、金谷内外:西晋士人真貌·····	84
二、陆机:在“缘情”与“缘题”之间·····	90
三、潘才与潘性·····	96
四、寒士人格与左思咏史诗·····	104
第六章 兰亭玄渚 ·····	110
一、玄学人格对自然名教的调和·····	110
二、东晋玄言诗的人格内质·····	116
第七章 悠然见南山 ·····	123
一、理想人格与生存方式·····	124
二、形、影、神——人格对话·····	129
三、乘化以归尽——人格升华·····	134
下篇 魏晋人格的诗性建构	
第八章 风姿特秀 ·····	141
一、妙姿容,好神情·····	141
二、征神见貌,形验有九·····	147

三、容止与辞色	151
第九章 生死之间	159
一、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160
二、人之生也奚为哉	167
三、生命悲歌	176
第十章 出处同归	190
一、道之两途	190
二、山林魏阙之间	196
三、“卜疑”与“绝交”	200
第十一章 一往有深情	210
一、情性三品	210
二、钟情我辈	216
三、为情造文	225
第十二章 狂慎一体	233
一、长啸与默然	233
二、狂慎四绝:忤、痴、怪、诘	237
三、清峻·遥深·孤寂	243
第十三章 虚静与躁动	249
一、静为躁君	250
二、谁知我心焦	254
三、悲风爱静夜	261
结语 归去来兮	269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272
后记·····	275

魏晋文学的人格魅力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上下文中，魏晋文学的真正魅力何在？人的觉醒，文的自觉？五言腾跃，志深笔长？从曹操之梗概，到陶潜之冲淡？这些既定的结论，自然是不错的。若换一种眼光，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重新解读魏晋文学，便会有新的发现。

一、何为“人格”

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其实不然。给“人格”这一过于通俗的概念作理论界定，并非易事。日常话语中的“人格”，仅指一种关涉伦理道德的价值确认。心理学家们又将“人格”的内涵弄得异常复杂，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曾综述出 50 条人格定义^①。

“人格”一语源于拉丁文，原意为“面具”。心理学史上，早期的人格定义，指个体公开的自我，或者说是一个人在公众与社会中的

^① 参见陈仲庚、张雨新编著《人格心理学》，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 页，第 31—45 页。

形象。这个“面具”(形象)可能好看,也可能不好看。因此,“人格”一词可以用“高洁”或“庸陋”来修饰。)人格心理学发展到本世纪初,在注重“外在形象”的同时,更注重“内在结构”。比如精神分析学说的人格理论,将心理结构中“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冲突与谐和,视为个体人格的全部内容。

(古代汉语中虽说没有“人格”这个词,但我们的古人做“人”,向来讲究“格”,所谓“言有物而行有格也”^①,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礼记·缙衣》)。这个“格”,其外在形象是气质、风度、容止与行为;其内在结构则是建筑在特定哲学—美学理想之上的生命意识、精神境界、伦理规范、人生追求等等。)中国古人所循之“格”,既有着或儒或道或佛这种观念形态上的区别,亦有着或狂或狷或逸这种个性心理上的差异。忧道殉道的忠烈与飘然尘外的隐逸,其人格的外貌与内质大相径庭;即便同为隐逸的酒人,也有着“拍浮酒池中”与“把酒话桑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格形象。

给“人格”一词作理论界定,首先须澄清三个问题。

第一,不能将“人格”简单地等同于“人品”,因为后者仅仅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圭臬的评价;而前者则是以人生哲学为基础,以气质个性为显现,以审美理想为旨归,以道德伦理为规范的整体性评价。这种既有哲学—心理学内涵,亦有伦理学与美学意蕴的为人之“格”,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格”。

第二,人格是一种整体性呈现,而这种呈现的基本特征,是谐和统一与冲突裂变的起伏交替。个体的人格冲突,发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和人格构成的不同层面,主要包括:外形与内质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后者亦可表述为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之冲突。所谓“理想人格”,是指人格主体内在的哲学—美学理想、精神境界、人生追求;而“现实人格”,则指人格主体的外在行为和外显

① 本书引文内的着重号均为本书著者所加,下不另注。

形象^①。

第三，人格与我们常说的心态也是有区别的。心态指人格主体的一种心理趋向与情绪状态，它是人格内在构成的要素之一，在特定的时空中，个体的心态可以反映出人格内质的某一层面（或方面）的态势，但不能据此而将人格与心态等同。

概言之，所谓人格，是指整体性地呈现于生活中的真实的自我，它包括了外在的气质、风度、容止、行为，和内在的哲学—美学理想、精神境界、伦理观念，以及人生各阶段与人格各层面的心理趋向与冲突。对文学家而言，人格不仅呈现于日常生活，还呈现于文学作品。文学家的人格，在其审美创造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活行为中生成，审美创造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人格的生成过程。因而，对文学和文学史的考察与研究，不能不涉及“人格”话题，或者说，不能缺少“人格视角”。

二、魏晋人格

站在“人格分析”的特定角度来考察文学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是这个民族心灵的诗性展示。在特定的文学史阶段，具有相同文化—心理背景和审美创造倾向的文人群体，其人格建构表现出大致相同的理想追求与现实行为（亦即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并形成独特的人格范型。本文所说的“魏晋人格”，即指魏晋作家的人格，或者说，是对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人格特征的总体性指称。

用上一节所界定的“人格”定义来分析“魏晋人格”，可以概述其三大特征。

第一，魏晋文人的人格形象是颇有魅力的，后人提起魏晋名

^① 参见高晨阳著《阮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6页。

士，自然会想至诸如“邨下放歌”、“竹林酣畅”、“兰亭流觞”、“南山采菊”一类的风流形象。然而，在魏晋人倜傥潇洒的风姿神貌背后，却是苦痛的灵魂。魏晋人格的内在结构，有着各个层面的冲突，比如宗儒与宗道，崇礼与毁礼，仕宦与隐逸，趋雅与逐俗，狂放与谨慎，虚静与躁动……这种种的冲突，既导致魏晋人格“理想”与“现实”、“外貌”与“内心”的相悖，又酿成魏晋人格“日常生活式存在”与“文本式存在”的相异。从根本上说，魏晋人格是一种悲剧性发生，她的文化—心理价值与哲学—美学内涵，正在这具有悲剧意味的心态矛盾、人格冲突中铸成。

第二，魏晋文人超越其人格冲突的主要途径或行为方式是审美创造与哲学思辩。人格主体依据自己所选择的为人之“格”，在其诗文作品与哲学著作中消弭、化解内在的心理焦虑与人格冲突，最终自塑出具有审美内质与诗性精神的人格形象。定型于诗文作品中的魏晋人格，大体上以慷慨悲怨与冲淡玄远为审美旨趣，以自由自然清虚真率为内质。魏晋人格的这种玄学旨趣与惟美倾向，既不同于她之前的汉儒人格的中庸与柔顺，又有别于她之后的盛唐人格的奔放与沉郁。

三、魏晋人格与魏晋文学

“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①。魏晋人格以一种“冲突”或“痛苦”的方式，以一种“悲剧式”的发生，承担着悲慨而厚重的魏晋审美文化与魏晋艺术精神。透过魏晋人格在心路历程与心理建构中的所有的悲剧性冲突与裂变，我们看见的是人格主体对美的执著，对精神家园的寻觅，对自由与自然境界的痴迷。魏晋文学艺术乃至整个魏晋文化的独特魅力，她的主体性缘由，正在于魏晋人格，正

①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页。

在于魏晋人格的悲剧发生及其所内蕴的艺术精神。

基于此认识，本书将分上、下两篇来探讨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的关系：上篇“观澜溯源”^①，追寻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下篇“璧肌分理”^②，辨析魏晋人格的诗性建构。

魏晋文学是魏晋人格的精神投射与诗性显现。魏晋文学的发生、流变与归宿，也就是魏晋人格的发生、流变与归宿。为先秦儒家所塑造的士大夫人格范型，经党人之激扬与曹操之悖逆，至汉魏之际已几尽断裂；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在“中断”之前提下，历经“邨下一竹林一金谷—兰亭—南山”之地理移位，以及与之相表里的“孕育—徘徊—焦虑—消释—重铸”之心理流变，最终形成委运大化、真率冲淡的人格范型。魏晋文学千古不衰的魅力，正在这人格生成之悲慨与人格归宿之平淡的张力中铸成。

魏晋人格是魏晋文学永远的神韵与不死的魂灵。魏晋人格远承庄学血脉而近铸玄学内质，“处昏上乱相之间”（《庄子·山木》）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天下》），在一个苦痛的时代求索对灵魂痛苦的超越之途。魏晋人格的内在冲突在“生命意识—处世哲学—情感特质—伦理观念—心态祈向”等不同层面全方位展开，从而酿成“生死—出处—情性—狂慎—静躁”的对峙与统一。魏晋人格的悲剧性冲突，在魏晋文学中充分展开，从而铸成了魏晋人格自身的审美内质，同时又赋予魏晋文学以一种人格化的清风峻骨。

文分两篇，意则一贯。从魏晋文学看魏晋人格，便可求出魏晋文学的人格之因，便可探出魏晋文学的人格化途径，便可看出魏晋文学的魅力实质上就是魏晋人格的魅力；从魏晋人格看魏晋文学，又可求出魏晋人格的艺术之质，又可探出魏晋人格的艺术化或审美化的途径，又可看出魏晋人格的魅力实质上就是魏晋文学的魅力。艺术的人格化与人格的艺术化，作为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的双

①② 刘勰《文心雕龙·序志》。

向互动关系,最终铸成魏晋文学与人格的永恒魅力。

关于魏晋文学研究的“人格视角”,已经引起学界关注;但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尚无人专门从“人格分析”的角度系统研究魏晋文学,尚无人深入地揭示出魏晋文学的人格魅力。宗白华先生称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苦痛的时代”^①,也是“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②;国内学术界的魏晋文学研究,其重心多在于探讨“苦痛时代”与“美的成就”之关系,亦即揭示魏晋社会政治、哲学思潮以及士人生活对魏晋文学及文论的影响。刊行于八十年代后期的王钟陵教授《中国中古诗歌史》,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动态建构过程,来把握中古文学的历史演进,为魏晋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此外,于九十年代问世的几本有关魏晋文学研究的专著,亦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对该时期文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关系的分析。所有这些,都为作者的理论探讨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学术基础或前提。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魏晋文学既是一次大的转型,其自身内部又有许多次小的转型。这两种意义上的文学转型都与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的生成流变密切相关。本文采用中国传统文论“知人论世”、“规文见心”等方法,并借鉴西方人格心理学的方法与观念,重新解读魏晋文学,在民族心灵史与古代文学史的双重背景下,追寻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演绎魏晋人格的诗性建构,从而揭示魏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魅力。同时,从魏晋文学的历史流变中标举传统人格之范型,为当今社会的文化转型与人格重铸提供史鉴。

①② 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页,193页。

上篇

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



第一章

庄学渊源

魏晋文学的人格流变几经曲折，最终归于南山的宁静与清新，归于陶潜诗文及人格的冲淡与虚静。（“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文心雕龙·序志》），站在魏晋文学之人格流变的终点而追根溯源，我们发现魏晋文学与人格有一个遥远的起点，那就是《庄子》一书所描述的理想人格^①。庄子人格的精神实质及特征，既是魏晋文学的人格之始，同时也构成魏晋文学与人格之流变过程的一条一脉相承的主线。

一、《庄子》理想人格及其特征

庄子所处的时代与后来魏晋人所处的时代，有一个共同之处：战乱频繁，天无宁日，用《庄子·骈拇》中的话说，是“天下何其嚣嚣也！”《庄子》一书，常有对战国时诸侯国之间侵城掠地之攻战和诸侯国家内部夺权争位之内讧的描述与愤慨：“夫杀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养吾私与吾神者，其战不知孰善？”（《徐无鬼》，本节引《庄

^① 参见崔大华著《庄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170页。

子》只注篇名)

乱世中的庄子，既是一位贫者，又是一个位隐者。《外物》说“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魏)监河侯”；《史记》本传说他“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某日，庄子衣粗布著破履见魏惠王，魏王问“何先生之惫邪？”庄子答曰：

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

(《山木》)

庄子一边说自己是“贫”而不“惫”，一边又认为身处乱世而欲无惫是很困难的。当然，庄子不会去做比干那样的忠谏之臣，也不会如孟子那样“养吾浩然之气”而“兼济天下”，但庄子并非没有自己的理想，并非没有自己的人格追求——这也就是庄子“非惫也”的言外之意。

同处乱世，儒道两家的理想人格是不一样的。孔儒学说对人格的塑造，其要旨是以等级制下的仁义礼乐去规范人格主体的心理与行为，是以忠君、忧道、立功、建名为人格主体的行为准则与楷模，这种理想人格的名号叫“圣人”。庄子曾猛烈抨击孔儒“圣人”，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虽重圣人而治天下，则是重利盗跖也”(《胠箧》)。而庄子理想中的人格亦号“圣人”，《逍遥游》有“圣人无名”，《齐物论》有“圣人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同号“圣人”，其人格精神恰恰相悖，庄周的“圣人”，与《庄子》中经常出现的“至人”、“真人”、“神人”等名号一样，都是对道家理想人格的描述，其精神实质是摆脱事务利害乃至仁义礼乐的外在束缚，超脱自然的、社会的、个人的种种局限，从而追求一种形而上的逍遥之游，追求一种从心理到精神的自由、自然之境。

“处昏上乱相之间”的人格主体，其生存困境必然导致心理焦虑。因而，对生存困境的超越对心理焦虑的消释，便成为彼时任何一种人格理论对现实的回应。而《庄子》理想人格，作为先秦诸多人格理论之一家，其独特价值正在于它致力于对人格主体之困境与焦虑的超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庄子》理想人格成为后来魏晋文士的人格起点。

第一，齐一死生：对死亡焦虑的消释。

《大宗师》：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近，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庄子齐一死生，故不悦生不恶死；而所谓“出”与“入”，“往”与“来”，“始”与“终”，“受”与“忘（亡）”，仍然说的是“生”与“死”。庄子主张以“翛然”之心态对待生死，陆德明“释文”引“向（秀）云”：“翛然，自然无心而自尔之谓也”。生命来自于自然，死后又复归于自然，故人格主体须以一种自然无心之态去对待生生死死，在生死面前须任运随化，无所牵挂。庄妻死，庄子鼓盆而歌，便是“翛然”，便是“自然无心”。

庄子并非没有对人生短暂的悲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齐物论》）！庄子正是清醒地认识到生来死往的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才主张从对生死大限的心理焦虑中解脱出来，“以生死为一条”（《德充符》），视生死存亡为“一体”（《大宗师》），视肉体生命之殒灭为精神之“大归”（《知北游》）。于是，对于庄子的理想人格而言，死生的界限不存在了，由生死之大限所酿成的心理焦虑也被消释，这也就是《田子方》中所描述的“死生亦大矣，而无变乎己”的“真人”的精